

# “语言创世”中人之“意志身位”的伤悖

张凯迪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口 570228)

**摘要:**在张志扬 2010 年出版的《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扉页引《圣经·约伯记》中话语“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作为序言总“谕”。与他“不得其‘门’而入”那时已有不同,探囊西学的“虚实”之后,“门”似乎有了更为切身的临界问题视阈——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由张志扬提示的西学历史一隅——法国近代史,可看到关乎人类命运的一次重要的启蒙转向:(宗教)神本转向(科教)人本。张志扬认为,这次转向所体现出的“语言问题”即是学人们的“身位”本质问题。以批判的视角重审这段历史,张志扬提出:中国百年启蒙,是将自己双眼“蒙蔽”在西学“语言创世”“修辞语病”中“启蒙救赎”的“连环劫”——不启蒙,亡国;启蒙,灭种(族)。

**关键词:**启蒙;语言问题;法国近现代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 一、序曲:西学语境历史一隅思 入启蒙理性思想之“门”

如何由西学语境历史一隅思入启蒙理性思想之“门”?本文是以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时间跨度为一百年 1911—2011 年,与“辛亥革命”同步)》这篇文章为“题序”展开思路的。这篇文章的实际目的并不是要进入“三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积累与传承”的具体分析,他的着眼点在于对(中国)“学术成其为学术”的那些前提条件的反省与检讨。张志扬认为:“正是这样的前提,导致了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积弱而失落的命运。”<sup>[1]</sup>多的铺垫不做,他白纸黑字的文章已证过这个“失落命运”的始末,我们只“观入”张志扬提示的这“一隅”<sup>[2]</sup>——法国近代史。

尼采向基督教宣战以后,“上帝”成了一个“褪

色的词语”<sup>[1]</sup>。众所周知,尼采(1844—1900)借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按照伏尔泰的临终“判决”宣布:“上帝”“甚至再也不是一个概念了”。他称这是“古典趣味”的伏尔泰“不朽的遗嘱”<sup>[3]</sup>,这(遗嘱)“高度概括了这位极其勇敢的思想家所做的斗争”:古典趣味不同于基督教趣味的关于“神性”概念的设定——基督教是“卑鄙的迷信”,它的理想是一种对神性的讽刺和贬低。

自那时起尼采就洞察到,“上帝”词性身位的转向迟早是西学语境的必然。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尼采之前,“语境转向”问题,在这种(启蒙性的)意义上已然触犯到“上帝”的“禁忌”!譬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作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尖刻指出的:“全部形而上学的胡扯,都抵不过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证。”<sup>[2]</sup>这个

**基金项目:**海南省创新课题项目“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意志身位问题——张志扬哲学思想研究”(Qhys022-27)

**作者简介:**张凯迪(1983—),女,河南商丘人,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

评价不啻为毒过尼采的判决,且更加开门见山!无疑,这批大哲们为尼采的“敌基督”工作垫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这些基督教怀疑主义者,在尼采之前差不多已经把“上帝”贬下了“神位”。我们还得了解:狄德罗所下的这道“判决”,实际上乃是他和伏尔泰(1694—1778)——这位法国启蒙思想运动“泰斗”的身侧,还有着大批启蒙思想运动的优秀领军人物(共同并肩作战,将“苟延残喘”的上帝“置于死名”,乃是“启蒙理性”思想的合力结果)。这些思想人物包括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1689—1755)、“大革命之父”卢梭(1712—1778)、百科全书代表狄德罗(1713—1784)、以及同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1724—1781)、苏格兰的不可知论者休谟(1711—1776)等。

伏尔泰被称作“欧洲的良心”。他的《牛顿哲学原理》诞生之前,英国的霍布斯(1588—1679)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并革命性地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的革命口号是“宗教乃人类无知和恐惧的产物”。通由《利维坦》描写的——一架“人造机器”般自然状态下的国家,实则是霍布斯倡导的所谓“社会契约思想”(或许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依据这一思想雏形)。与此同时,法国的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凭借着“梦境”产生的“我思/疑故我在”之哲学新命题,成为了近代“哲学之父”。在笛卡尔之后,牛顿(1643—1727)诞生了,世界仿佛自此换了纪元。

此之为狄德罗那句振聋发聩的判词大体上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是继文艺复兴时代之后,“人本思想”再次转向所开辟出的重要道路。按照张志扬对“启蒙观”的分类法,这个时期的启蒙重点主要落脚在“本体论”的“人本”认识转向上。“本体论”一直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重要分析内容,它的分析对象基本上一直是基督教“上帝”<sup>(4)</sup>。我们由西学历史内容可大致了解到,无论“神本”还是“人本”,“上帝”在其中始终不曾真正退场。研究语言学的人们深知,此“本体论”由来之始末,恰恰也是西方学术

无法侧目的“语言问题”。尤其是在“神本”转为“人本”之后,“语言问题”则更加一目了然地呈现在知识分子面前。张志扬先生曾说,圣经就是一部“语言创世史”。“于是,尼采把西方形而上学推到极端——话说绝了:没有上帝,没有本体,一切都是虚无,正因如此,唯‘强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虚无之上跳超人之舞、重估一切价值、永恒轮回。”<sup>[3]7-8</sup>

从狄德罗的“判词”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怀疑论们的思想反省早在自己的“启蒙”(理性)意识中就已经触及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问题,判词中“形而上学的胡扯”对应的大概就是学术语境中的最高本体“上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的治其身之“道”,即是众多思想家合力促出的“科学理性”。那时,牛顿“万有引力”学说作为从“神本”转向“人本”的证据,从根本上撼动了“神学哲学”的“地基”,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语言问题”。

发现“语言问题”乃是一个契机,法国启蒙派的革命矛头指向的乃是基督教“上帝”。他们将思想之果掷向“原罪”概念这个“开‘头’”:众所周知,“人”是因为一颗果子被贬出伊甸园的;在几千年后,另一颗果子,又“开创性”地自动砸在了牛顿“头”上(重点不在于牛顿这个名字,在于“头”因此获得新的“启示”)。继“神子耶稣”之后,“原罪”这个诱因再次倾覆了“人”之为人的价值观念。

由此,我们最有必要地,是先认识清楚基督教“原罪”的本质,以狄德罗对此问题所做的诸工作为例——这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狄德罗),曾一度因为(持续笛卡尔的)“怀疑”(信仰的权利与资格问题)精神陷入“自我诘难”,他以“第一”人称“我”的运思反身证鉴:同样一种品质,在不同对象的身上是否可能出现两个相反的定义?譬如它在一个人身上令人们尊重,在另一个人身上却被轻视呢?因为有基督教“人人皆兄弟、皆是上帝的儿女”这个爱的理念作为基础,所以狄德罗认为,这当然是不能的。由此,狄德罗推出:无论是谁(任何基督徒),都可以毫无负担地排除人在本质上有差异这个痛点,转而进

人“我绝不会把我在那个人身上当作一种德行景仰的品质看成这个人身上的一种罪恶”这种判断习惯。显然,狄德罗的观点合理合据,可以毫不费力地令人们认识到:在这种语境设定的前提下,成百上千的别人没有理由不能同自己拥有同样的权利,任何权利——模仿自己所崇尚对象的权利。模仿,使信仰者拥有了同信仰对象一样的道德、一样的优美特点!自然,我们还得从没被狄德罗表达出的语言遮蔽处触碰到一个“入思”缺口:人的外部行为可以模仿,精神和思想是否也可以呢?跳出狄德罗这一语境,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迎刃而解。

基督教的“圣言”,一直以来装在信徒脑袋里的这个“常识”,狄德罗虽然没有明着提出来,下文中很快就有了“讳莫如深”的交代:他们(那些信众们)“为宗教而剥夺了自己的自然感情,不再做人而装成塑像,以便做真正的基督徒。”<sup>[2]3</sup>狄德罗没有对这个情形进行言语上的更多延伸,我们能抓住他的关注痛点就在于,人在“各种社会情爱废墟上”竖起的自我隔断之障——“千百根圆柱”<sup>[2]3</sup>。这个意象指摘的乃是,虔诚的信仰者与自我(意识)真实生活之间的决裂状态,即“为宗教”而将“自然感情”剥除出“人本”的苦寒清修状态。

## 二、“他性”身位本质的“入思”与“落入”问题

在宗教语境中,个人的“自然感情”始终是卑贱的,甚至是“罪性”的。约伯被验证不是其中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吗?倘若约伯身上有自然感情,如何能够欣然接受及享受自己生活世界被毁灭后得到的第二次高额奖赏?亚伯拉罕内心要是存有半点“自然感情”,又岂会甘愿杀独子献祭?用尼采的说法,基督教信徒身上的特征就是这种不重视个人“自然感情”的“奴性”——像“机器人”可以被任意设置程序、任由主子差遣的“奴性”。倡导摆脱受缚于宗教的“奴性”回归“自我意识”,是狄德罗时代“人本启蒙”思想转向的重要行动之一,但是事与愿违,这种转向证明了,人又以另一条真理之路,也即科学理性的道路秉承了这种“奴性”。

承认宗教“原罪”即承认这“唯圣言之命是听”的逻辑语境。张志扬在中国启蒙运动的“西学热潮”中对此种语境逻辑也有过一问:“惟命是听——叙事后设的同一性本体是谁许诺的?”<sup>[4]2</sup>

西学“语言创世”的历史中,这个“同一性本体”所指谓的“上帝”,作为一切信徒的“灵魂”,自然就是《圣经》上所言在一切“我”之内的“圣灵”。我们得明白,这个“圣灵”来自基督教宗教内部革命之后的“新约”。张志扬此问切中的要害并非“上帝”这个指谓。而是《圣经》叙事之中,将“上帝”设定为“同一性本体”的那个“谁许诺”——作为“听命者”的尺度“根据”。换个表达来说即是:用这尺度为“人”标示出规定性的依据来自哪里?首先,它让人坚信自己生而携有“原罪”;其次,乃是令人深觉愧对为自己受死的耶稣。无论是“新(约)”的“尺度”,还是“旧(约)”的尺度,都或明或暗地示出了这样一条律令:有“自我意识/志”(自我主张)就是“犯罪”!但这很快又被另一种新型学说给修正:作为一种“禁忌”——“自我意识”这道“门”终是不能触犯。否则,“不确定性的代价”倚靠“本质假定的代价倒真是人们偿还不起的”<sup>[4]3</sup>。无论“人”怎样转向,似乎都跳不出自我意识长期居住着的那个牢不可破的“引号”!而“引号”不过是个修辞。在接下来的“理性启蒙运动”中,“人”的“意识”中寄居着的“上帝”的“圣灵”又毫不吝啬地抽象成了另一种更加“成熟”的“寄宿形式”:让“上帝”变成“人”自己——上帝本就是“人”与自身对立的那个部分!

上帝若只是一个词语的话,这条关于“罪”的律令究竟是谁定下的?是谁“许诺”这条律令可以驱使世界的?一个词语高坐神坛,成为判断善恶生死的最高主宰,它以“身位”缺席的“自在”,许诺并判决“上帝”指谓的词性正义——“仁慈的、善心的、终日浸泡在‘罪人’的眼泪里的‘上帝’,就是用它(正义)惩罚有‘自我感情’的‘人类’的。”

毋庸置疑,狄德罗在信仰这个问题上绝对是反动的,甚至不输尼采。他还胆敢如此说:“最正直的人是会倾向于愿他不存在的,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

想,从不曾使任何人感觉恐怖”,反之则大为不然<sup>[2]3-4</sup>。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在同样这个问题上,又一个勇敢的革命者,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跟自己分裂: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面,当作与自己对立的存在者。”<sup>[5]67</sup>何以至此呢?费尔巴哈又说:“原罪之所以成为信仰之对象,成为宗教真理,却正是由于每个人类个体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与普遍理性不相一致。”<sup>[5]3</sup>这意思不难理解,恰巧也正应和了我们上面刚刚讲到的人所具有的“自然感情”,不言而喻,“自然感情”是造成个体差异的基础原因,这点看来似乎无需过多赘论。人类本身有着反叛这种“自然感情”的倾向大概也正是出于具有“自然感情”这个原因本身吧?它天生自己跟自己对立,天生不平等的人类个体,难以接受并面对这个不平等事实,为了拉平这种差异,遂自己人为构造出来一个“上帝”,以及每个人皆要赎偿的“原罪”?

似乎这仍旧还不是最能服众的因由:在东方例如中国、印度,是没有这个“上帝”及“原罪”概念的。基督教“上帝”及“原罪”理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的确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并且究其关键,不仅在比狄德罗、尼采之类更早及更后大批哲学家的质疑中才能显现出问题,问题实际上一直就在那里,并且如此“显明”。张志扬指出:“‘上帝’就可以看作是一个集中的悖论,它首先表现为上帝与人对立。”<sup>[3]225</sup>

“悖论”这个表述,指向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这个事物现象在推导过程中遭遇障碍无法得出完整合乎意图、目的的结论,遂促使表述本身进入复杂化、模态化的宗教及其社会的偶在演化。<sup>[3]222</sup>这种演化,张志扬认为:它奠基于形而上学掩盖着的“裂隙”之上。<sup>[3]96-173</sup>

我们强调过这个观点不是某一哲学家的个人发明,它是众多中西方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反思结果的总和。

张志扬作为天生携带汉学母语反思意识的西学思想检测者,将发现的这一结果用自己独特的“思想叙事”方式,以“一个报信人”的“身位”,传谕于“白纸黑字”(亦可称“黑底白字”)<sup>(5)</sup>。犹像意义凝

结的“无形之君”的“信使”迎面而来。在这里,我们应申明的是,重点并不在于其观点,乃在于一个“携带母语反思意识”的“身位”归属。确切来讲,这是不涉及“立场”,只在于“态度”的一种“自我”认知的“知止”和“诚实”。

知所谓“度”者而“止”,识所谓“我”曰乃“诚”。“实”,即是因“知”所“行”出的“判断/别意识”,它携有身位“限度”的历史、“意识/志”语境和语境依据。前文我们反复涉及一个问题:“在‘语境’中的说,是否可以到‘语境’之外去听”?换言之,问题关涉的便是“听”者的“知-行”身位之归属:是在切身于听时仅仅“受听”,还是在“切身”之后“反身”对抗作为“受听”者的“奴性”?且以“关怀”之姿的真实面貌把握述者的“他性”,让自身进入“他性”这个事实本身?也即“思入”,而不是“落入”。

“思入”意味着能把握“进出”的“尺度”,且进行客观判断“自我”及“他性”的实际“限度”和“限度”存在的可靠语境依据。“落入”则不然,“落入”意味着被“他性”侵占、吞没,成为其“猎物”“俘虏”,一旦掉进“语言”的陷阱,怎么挣扎都只能缚紧于“语境”这张网,失去抽身而出的自由。

### 三、罪的“他性”指涉:“无意指的故意”身位意志

譬如狄德罗要向所有“神学家”“教父”形而上哲学复仇般的判决:“全部形而上学的胡扯,都抵不过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证”!我们不得不再重新回来掂度一下这句话的分量。首先我们得认识到,狄德罗自己是否也落入了论证与被论证的漩涡?他能否脱离基督教的语境去求证那个神性的“最高本体”?从相关(狄德罗作品)著述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上帝存在,要么上帝不存在,非此即彼。要作出评判,他只能求靠形而上学的论证语境。若问及是谁许诺那“同一性本体”,或许得先追问“你是谁?在世界上,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审判?这个人作为个人有审判的权利和尺度吗?”<sup>[4]4</sup>狄德罗的尺度是:“不以我的一时之见为转移的真理,应该是我的判断准

则。”<sup>[2]3</sup>当他情不自禁论证“上帝”是否存在时,就不得不停靠在基督教原语境,即《圣经》创世的意义上结构中去梳理一切见闻。然而,跳出宗教的眼界时,他看到的世界又成了具有齿轮、缆索、滑车、弹簧和悬摆的机器。狄德罗说,这要多谢牛顿、穆申勃洛克等伟大人物的工作,使得人们价值天平上的真理尺度理所当然滑向了“实验物理学”,他们找到的“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跟形而上学没有半点关系,世界不是笛卡尔等哲学家沉思得来的“唯物主义”的“危险假设”,世界从一个神变成了一架机器。<sup>[2]8</sup>

在传统自然世界观的意识中,这话听起来简直荒诞好笑。一方面,因为我们不可否认,嫌弃“形而上学胡扯”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证”,不仅仅证得了过往的荒谬,还引得另一支科学主义队伍前来分流,使“形而上学”的“形而上”者也生出自我怀疑和自我证鉴!那让撒旦察看约伯的上帝不也曾落入某种考验吗?另一方面,一个虚构出来的神性“指谓”(西学自嘲的至高“本体”——“上帝”),几千年来先是沦为“神学”概念,然后再去占领精神语境以殖生解释不清的荒谬理论为生。

它曾几何时反身成为过历史之镜?现如今,这么唐突地就照见了“真理”充其量只是一道镜中之影?当苹果垂直落向牛顿时,是不是“上帝”(们)连眼角的余光都会显得尴尬呢?

我们是否可以想见,(此“真理”翻不翻得出基督教上帝的“词性正义”这个设问暂且不提),“论证”这个表达方式本身是否已经跟谬妄语境的“词性正义”签订了某种自己也看不懂的契约?作为判断尺度,无论是判断人,还是判断精神,就难怪它如何可能不“落入”复杂化又极其荒诞不经的逻辑系统中去了。狄德罗自己也说:“本体论的那些精细推论,至多只是使人成为怀疑论者。”<sup>[2]8</sup>他的一番言论,究竟是要指导人们向自然去认识“神义”的,并且这种“认识论”独靠传统“形而上学”观念大约是不能推及的。

狄德罗认为,单单靠传统的“形而上学”没办法抵挡“压倒性”的“整个宇宙的重量”。承认一位“上帝”的存在,需要通由“自然的作品证明自然中有一个最高实体的心智”;“枯燥的形而上学观念组织不适于揭露真理,却只能给真理一种谬妄的气氛。”<sup>[2]11</sup>那么也就可以说,语言本身是有限度的,它的“语境限度”着实影响了文字发挥“自由”的“天赋”!世界从一个神骤然变成了一架机器,如果不是伊甸园里那枚禁果不小心掉错了地方的话,还能是因为什么呢?当我们问,“需要撕破禁令靠伸手去摘的禁果却自动掉在成天都在研究《圣经》里的‘圣言’之人——牛顿的头上<sup>(6)</sup>,这样的神迹是‘三段论’能说得明白的事情吗”之时,亚里士多德或者康德会怎样回应?亚伯拉罕的大祭司会怎样理解?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表达过一个观点:牛顿的故事颠覆了知识树的神话,从此牛顿的后来人勇敢写下他们自己的“创世纪”神话,虽然故事的开头是因为一颗苹果砸了牛顿的头,但苹果岂是故意的吗?<sup>[6]87-88</sup>

这就像是在提醒我们,无论宗教语义怎样行使它“植入性”的霸权统治,都免不了在自己“一切皆疑”的验证与被验证“根性”上生出“被动入局”者的“自我创世”“仿生”意识和行动取向。这个问题,还可以举个最为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说:譬如上帝创造出来住在伊甸园中的人,不光能听见上帝的言语,同时也能听见蛇说的话,这就使得人有了与上帝对立的基本条件。我们是否可以指问:上帝既然那么意愿人只听从于他,只尊他一神为信仰,为什么在造人的时候偏造得“人”有能与其他物事“相闻”的两只耳朵,并那意欲模仿“神”而生出的二心呢?换言之:这样使自己总陷于无法解释的“悖论”中的“创世”之举,“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岂是故意的吗?

用西学传统语境中“人”这种“上帝”形状的“限度之‘物’”粗略地去理解一切,上帝必然得是故意的!这“无意指的故意”还形成了一个传统:仿生于“上帝”的“权利等价”传统,亚当因为吃了一颗果子被赶出伊甸园,牛顿却靠着一颗果子,把伊甸园搬来

了人间。这一点倒是契合了我们前面讨论的狄德罗反身自证的“实验逻辑”。

显然,(我们能因此理解)此种证鉴脱胎于“基督教”“原罪”意识文明之尺度,它(这个尺度)确证一件事,即没有“原罪”便没有“人”。它转升为笛卡尔的“我思/疑故我在”逻辑系统并成为评价主体存在与否的新尺度,把“上帝”这个概念解体以后,此前的“语境”限度也将随之一并解体,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式的推理结构:

我“信”故“我”在 → 我“思/疑”故“我”在  
 ( “上帝”是“神” ) ( “上帝”是“迷信” )

基督教语境中的“上帝”虽然被打成了“迷信”,但不妨碍人们重新认识那个造了这世界又造了人类及万物的“自然上帝”之存在方式,他的神性就在“我”之内,因此,我能同他一样创世,后来的不少哲学家又因此推出:我“创世”故我在=“上帝”是“我”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们不得不说,掉在牛顿头上的那枚果子,它仍然还是故意的!<sup>(7)</sup>它承载着“自然上帝”的神性及反叛传统基督教“神义”论的“自我意识/志”,化作一个新的启示,来传“喻/谕”“原罪”价值的暂新尺度。脱胎于“约伯”以被验证反证“上帝”本真意识逻辑的面具化之“听”限度的新指涉、新“教义”,即人必须由“受听”转向“主述”,由超验转向经验的创世“自由”——“人本创世”的合法权利自由。因此,狄德罗所说的“那种天启、奇迹、非常的使命之类的时代是过去了。基督教已不再需要这种胡鬪了”<sup>[2]20</sup>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很打脸。众所周知,牛顿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用赫拉利的陈述来说,他“花在研读《圣经》上的时间远比研究物理定律要多,但他促成的科学革命却让上帝就此退场。”<sup>[6]88</sup>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知识树成了提供人类进军科技天堂“圣餐”的仓储,“好奇心”从“原罪”变成了无穷的“创造力”。

#### 四、附“释”与“解”语:西学“身位”

##### 叙事预言的修辞语病

作为“新教义”之“谕”的暗示,它鼓励人们饕餮

知识来增加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力量!就此推断,狄德罗说“世界不是笛卡尔等哲学家沉思得来的‘唯物主义’的‘危险假设’,世界从一个神变成了一架机器”这话,又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世界在他们不断掴自己耳光的伴奏声中驰向新“神迹”所“式出”的图景:仿佛“预言”兑现的“许诺”,令一切审判者最终都要先完成自审,才能避开“独步虚无”的雷区。世界不是“我思/疑故我在”,世界是让“我思/疑故我在”的人统统都无法“存在”!

以此反观:创世神话中人因“误”听蛇的蛊惑“偷”食禁果,又岂非是故意为之呢?是人的“故意”,还是统治人的“上帝”的“故意”?按照以上等价逻辑来看,自然非“故意为之”莫属:在这里,不必区分是上帝意志迎合人的意志,还是人的意志仿生于上帝的精神述求。只看其“结果”就可“以斑见豹”,生动还原张志扬说“这里掩盖了一桩不可言说的阴谋”<sup>[4]9-10</sup>的最初动机:目的高于一切!目的即作经者“语言创世”的“人本意志”指涉,用“无意指的故意”这种修辞去叙述“神迹”“天启”现象当真是一种蒙蔽真实意图的绝妙手法,被启明了双目的“人”的智识中,它也确乎不失为一条“将错就错”一步到底的“末路”。若说当初是人借着“被上帝驱赶”之名离开了伊甸园,怎么着也可算得是“识抬举”的“智慧”行为了。“自我意愿”的“借名”之慧,从古至今都是“人”优于其他物种的天赋和专利,“人”作为奇乎妙哉的“上帝杰作”,那颗禁果当真不是没白吃的。可是如此一来,世人岂不再次全都知晓,上帝自诩的那种“全知全善全能”又被愚弄了一次?“发明”多少种解释,才能弥合这种不可能存在的“存在”逻辑上的“语法”问题?只有自以为是者才会认为《圣经》作者(们)笔下,“人”这种“自求多福”的“被造物”还想重返那座“无欲无求”的“乐园”。到底是“人”终有一死,还是人想要“上帝必须死”在自己“终须一死”的“死”之范畴中,却不得不“帮”他空留一樽不必担当(生死善恶)真实因果的“灵”位?<sup>(8)</sup>不好说究竟谁才是谁的傀儡: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善”如流者,所看皆是“利己之

‘用’”！何以“诚实”？那是最没价值的东西！

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安息”岂能有假？每日不停忙着各处制造“神迹”的是谁？每时每刻不止息地制造“变乱”与“战事”的又是谁？

想必那棵“智慧树”也是假的——不！“安息”可能确是真的，怪就怪人类后来上演的剧情太假，看上去全是引诱“上帝”入戏的。假到跟“上帝”创世一样，充满“语法”错误。“病句”结构建造的“巴别塔”悖论，预言着一切可与“变乱”等价置换的意义关系：犹太这个神的特选民族，就是如此被置换成为无家可归的“耶路撒冷自由精神”；神圣的罗马帝国亦如此被置换成“十字军”与“纳粹共和”；神秘的中世纪也如是被置换成“日不落”的“白色神话”。

“上帝”，请别人戏太深，别总是自诩主宰的工：“起源”“创世”“造人”“审判”“天国”“末日”，你也有在“知道”中缺席的时候，“人”可一直是真的清醒，他们深刻知道自己不是人，所以甘愿活在“引号”中，引“万有”之“至高存在者”成为统领诸神之“主”，遂以“引号”的指引为令：所谓知善恶，便也就是能够“使用”善恶吧！由此看来，伊甸园中禁吃的智慧之果定然不假。它令人除了“死性”不改，其他皆可改。此乃“智慧”之力（量）！“六神无主”亦需留意：“主”宰之主，迟早是要宰杀“无主”之“神”的！

比方说“巴别塔”的预言，众所周知，它果然成功地“预言成真”垒陈了层层铺垫，埋下了高妙的伏笔，且笔势如“绝笔”，末日不是最后一天，自那以后，人类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末日”的第一天。就是蛇对女人说的那句：“你们未必会死”！

自那以后，人类时时都能领悟到“死”即将到来的“末日”。然而，谁会料到有那么一天，“上帝”却死了呢？“上帝”都死了，那些靠着“上帝”这个指谓生造语境制约世界的传谕者们拿什么再去向自己虚构的“意义工程”汇报德业？若按照“权利等价”逻辑去推，“伍尔索普庄园”的主人们，难道愿意欣然乐见“一个苹果砸了牛顿的头”——这个新的“创世

纪”神话从人类日历中被撕下来的情景？那一天是新的“末日”吗？当果真有那么一天，“牛顿”的名字从神话的记事簿上被撤下来，还有哪一种“形而上学”能让自己的骨灰再次从“启蒙”的语境场中扬弃？接下来会接到谁死了的噩耗或者是“喜讯”？

“人也已经死了”<sup>(9)</sup>，幸存的只剩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烧都烧不完。黑色的“蘑菇云”不再只从一处升起，沿着所有的海岸线、（最高的和最低的）山脉、混凝土森林，这朵厄运的“祥云”将占领一切珍藏在人类博物馆中的纪念品，《死亡的胜利》<sup>(10)</sup>将是（血肉做成的“自然”）人之手自我描绘的最后一幅“图景”！它记录着“人类精神”战场最后的实况，唯一遗憾的大概是，没能在每颗“骷髅”上标记“名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克洛及他的继承者们、麦蒙尼德、李普修斯、西塞罗、培根、雅各波墨、笛卡尔、斯宾诺莎、牛顿、莱布尼茨、巴克莱、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唯“死性”根植泥土回归大地，“永生”确实只能属于“死神”。

那样的世界多么值得“期待”：“绝对光明”终于照进少数“人”（精英阶层——“超人”）的现实，让这世界确乎其实有如沐身在“天国”的“白色神话”中！

“图像化时代”的新主宰们若无其事地说，问题仅仅出在“破碎”的“本体论”语境，在“未来”，“等到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其他科技的果实终于成熟，智人就会得到神的力量，兜了一圈再次回到知识树下。”<sup>[6] 88</sup>

后来的现象学家们接着说，这个破碎的“语境”只属于“形而上学”，破碎的不是“本体”“意志”的真实身位，应该足够乐观！再让那“无意指的故意”派一个“先知”高喊几年“形而上学之死”就可以草草了事，然后开启下一个新纪元——“语言范畴”作为“工具化”理论的超自然人纪元！

## 五、结 语

这帧“历史一隅”的浪改，不仅促动人类世界思

想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使得“人”的“自然”意识广受牵连,其意义犹在《知其白守其黑——西方历史的白与黑》“立范卷”扉页黑底白字的“两块碑铭”<sup>[7]</sup>。人们脱离通常汉语原语境意义上理解的“黑白”,在启蒙理性侵入中国学术语境之后,“黑白”的义阈则势如倒戈的军团,由传统的敞开状态逐渐闭合为追求真理、抵制恶、驱逐“黑暗”、倡导“绝对光明”这条“科技理性”之路。此种“闭合”状态,本身似乎就容易陷入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境遇。本文概述此举为:西学“语言创世”中人之“意志身位”的伤悖,读者如何理解这句话,也全在于其“后叙性”。

“以斑见豹”看待这个“历史一隅”,启蒙理性思想自然不无反思之处。但以完全“负典”的视角揭示,说不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迷悟,所以才更需要人们具备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意志身位”,去面对历史话语的、社会环境的、文字语境的及生活现实的各种“浪改”“冲力”与机变。

#### 注释:

(1)作者在原文中给这句话做了脚注:“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使中国比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更深入更全面地探底西方文化的命脉。”读者千万不要忽视张志扬先生任何一句话,譬如这句,就极为关键!铺垫已然在这句话中,“比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更深入更全面”这个判断,是基于张志扬半生研究对西学“文化命脉”的把握,并不意在盖称或泛指“整个(中国)学界”。参见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

(2)作者文中说:为了现象地类比此种意向,不妨暂时跳开一步,先到法国的近现代史中浏览一番。在西方的历史年表中,18世纪是以“法国启蒙运动”为标志的。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你听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大百科全书派”。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法国思想史上的“新古典时期”。可类比欧洲绘画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

的“古典时期”,相对法国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绘画而言,就代表了“新古典时期”,本章内容遂巡此线索自“一隅”进入。

(3)伏尔泰临终前对神父的提问“您信神灵基督吗?”愤怒地回顶了一句:“别跟我谈那个人!”在尼采的解读中,这句话成了一个判决,身为语言学天才的尼采对这句话中“人”这个语词的关切显然大于别的内容,不得不说,这个语词确实是非常关键:“神灵基督”与“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教语境中“上帝”的两个不同位格,伏尔泰这句话一出,自然做实了自己“不信”上帝的证明,尼采抓住这一点将伏尔泰划归到自己思想的阵营还真是眼光犀利!详参“尼采三书”《权力的意志》,孙周兴译,12卷9[18](13)、13卷11[95](347)。

(4)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张志扬的总结认识到:“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形而上学的两大阶段也就相应地规定了西方启蒙思想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启神性之蒙,达到人的理性。时间在两战之前,口号是‘上帝死了’。第二阶段:启理性之蒙,达到人的存在……,时间在两战之后,口号是‘人死了’。”详见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06页。

(5)意义犹像《知其白守其黑——西方历史的白与黑》“立范卷”扉页黑底白字的“两块碑铭”。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黑白”,势如倒戈的军团,追求真理,抵制恶,驱逐“黑暗”,倡导“绝对光明”。这行为本身似乎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之举。张志扬的《知其白守其黑》,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在我看来,都问出了一个问题:未经白,何生黑?何以是“立范”呢?

(6)这颗果子的言外之意或许不是想说,吃了我就会变得有智慧。大概它就只是想说,智慧早已经不是禁果。所以想掉在谁头上就掉在谁头上。但我们得知道,苹果落了,砸到的却并非每个都是牛顿。这意味着什么呢?

(7)本页重点字号全由本文作者添加。

(8)本意欲用“不得不‘给’他空留一樽不必担

当一切(生死善恶)真实因果的灵位”。随其义,领会全在读的“后叙性”。

(9)这句话出自张志扬先生形而上学西方启蒙观两大阶段规定的第二阶段口号:“人死了”,详参《缺席的权利》,第 106 页。

(10)参见老勃鲁盖尔画作,The Triumph of Death, 1562, Museo del Prado, Madrid, 117 x 162 cm, Oil on panel.

####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95.

[2][法]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M].姜天骥,

陈修斋,王太庆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4]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以]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7]墨哲蘭.知其白守其黑——西方历史的白与黑[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

(责任编辑 张亨明)